

# 北魏前期汉化的渊源

## ——对陈寅恪旧说的补正

潘忠伟

[摘要]五胡乱华时期,由冀州、并州、豫州、青州等地迁往辽东一带的世家大族及其学者,对北朝汉化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这一群体在接受慕容氏政权庇护的同时,也加速了以鲜卑为典型的北方少数民族的汉化进程。北魏建国之后,这批士族人物又为拓跋氏所留意和重用,参与礼乐、典章制度之建设,推动北魏汉化和儒学复兴。或者说,北魏前期的各项汉化举措,乃是继承慕容氏政权固有国策及其人才的结果。

[关键词]北魏; 汉化; 慕容氏; 陈寅恪

中图分类号: K239.2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3926(2012)01—0222—05

基金项目: 2010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北朝经学史”(10CZX022)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潘忠伟(1979—),男,浙江景宁人,四川师范大学政治教育学院讲师,哲学博士,研究方向: 北朝、隋唐经学。  
四川 成都 610066

关于北魏汉化问题,著名学者陈寅恪在其所著的《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一书中,有一观点特别受人瞩目。陈先生认为,隋唐制度的渊源“不出三源: 一曰(北)魏、(北)齐,二曰梁、陈,三曰(西)魏、周。”其中针对北魏、北齐一源,陈先生将之归结为北魏孝文帝及其子孙模仿采用的江左文物典章制度。或者说,陈先生认为北魏后期的汉化进程,乃是受到南朝影响的缘故。与此同时,陈先生又强调在北魏孝文帝之前,中古北方华夏文化的传承主要在于河西一隅,强调通过河西学者的努力,使得北朝礼乐典章制度在战乱之后趋于完备。<sup>[1](P.3-4)</sup>言下之意,陈先生认为北魏孝文帝之前的汉化举措主要受到河西学者的影响;而北魏孝文帝以来的汉化进程,则主要是受到南朝文化的影响。但是,此书对于北魏攻取河西之前的北魏典章制度及其汉化举措,却鲜有论述。换言之,在北魏完全攻占河西区域的延和三年(434年)之前,其早期的汉化进程及其渊源,也是今人不能不留意的重要问题。

### 一、慕容氏政权与华夏文化的传承

五胡乱华时期的北方各个少数民族政权,其统治者多有汉化之倾向。在这当中,对后世影响最为深远的,是兴起于辽东的慕容氏政权。这一政权笼络了大批流亡于此的世家大族。他们往往

为州郡之著姓、世代显宦,当然明习汉魏旧制和精通儒学。这批士族及其后辈亦在北方前期的汉化过程中,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魏书》所记载的明经之辈和文史之士,其父祖辈大多曾仕于慕容氏。由此,我们可说其时华夏学术之传承,并非仅有南朝与河西二支,与五胡政权采取合作态度的儒家学者,也是北朝华夏文化传承之主体。

今人对于五胡统治者的汉化倾向,应当持肯定的态度。事实上,包括后汉、前秦等各个少数民族政权的统治者,如刘渊、刘和、刘聪、苻坚等人,均颇有儒学修养,即便汉化程度较浅的石勒、石季龙等辈,也颇尊经重儒。《晋书·刘元海载记》称刘渊“幼好学,师事上党崔游,习《毛诗》、《京氏易》、《马氏尚书》,尤好《春秋左氏传》、《孙武兵法》,略皆诵之,《史》、《汉》、诸子,无不综览”<sup>[2](P.2645)</sup>。刘渊的继任者刘和也颇好学,“习《毛诗》、《左氏春秋》、《郑氏易》”<sup>[2](P.2652)</sup>。而代刘和而起的刘聪,其汉化程度也颇深,《晋书·刘聪载记》称刘聪“年十四,究通经史,兼综百家之言,《孙吴兵法》靡不诵之”,年轻时曾得到乐广、张华的赏识<sup>[2](P.2657)</sup>。后汉之后的后赵石勒,也颇为重视学术,曾立经学祭酒、律学祭酒、史学祭酒以及门臣祭酒等<sup>[2](P.2735)</sup>。石勒的后继者石季龙,《晋书·石季龙载记》称其“虽昏虐无道,然颇慕经学,

遣国子博士诣洛阳写石经,校中经于秘书。国子祭酒聂熊注《穀梁春秋》,列于学官”<sup>[2] (P. 2774)</sup>。北魏之前的中原区域,对于学术最为重视、成效也最为显著的当属前秦苻坚时期,据《晋书·苻坚载记》,当时整个北方地区政局较为稳定,几有形成完全统一之趋向,而苻坚亦采取各种措施,扶植学术,赞翼儒学,对于战乱近百年的中原而言,无疑获得了一个宝贵的恢复期<sup>[2] (P. 2888)</sup>。

当然,正是五胡存在普遍接受汉化和承认华夏文化的背景,其时中原汉族为逃避战乱的迁徙和流亡,往往也不以种族为隔阂,反而多有投靠少数民族政权之现象。《晋书·慕容廆载记》记载:“时平州刺史、东夷校尉崔毖自以为南州士望,意存怀集,而流亡者莫有赴之。”<sup>[2] (P. 2806)</sup> 崔毖以为凭借汉族著姓之身份,便可笼络流民,而事实却是“莫有赴之”。这说明其时汉族的流亡迁徙,其种族认同和归属感并不强烈。西晋末年中原流民的实际迁徙流向,也证明了这一点。《晋书·慕容廆载记》记载“时二京倾覆,幽冀沦陷,廆刑政修明,虚怀引纳,流亡士庶多襁负归之。”<sup>[2] (P. 2806)</sup> 意思是说,处于辽东地区的慕容廆政权,由于刑政清明,吸引了大量由中原和幽冀地区逃亡而来的流民。这充分说明西晋末年中原汉族的迁徙流亡,除前往河西和南渡江东之外,还有很大一部分选择了北徙辽东地区。而其时已经“渐慕诸夏之风”的慕容氏政权,非常注意笼络这些流民和其中的著姓大族,《晋书·慕容廆载记》又称:

廆乃立郡以统流人,冀州人为冀阳郡,豫州人为成周郡,青州人为营丘郡,并州人为唐国郡。于是推举贤才,委以庶政,以河东裴嶷、代郡鲁昌、北平阳耽为谋主,北海逢羨、广平游邃、北平西方虔、渤海封抽、西河宋奭、河东裴开为股肱,渤海封弈、平原宋该、安定皇甫岌、兰陵繆愷以文章才儒任居枢要,会稽朱左车、太山胡毋翼、鲁国孔纂以旧德清重引为宾友,平原刘讚儒学该通,引为东庠祭酒,其世子皝率国胄束脩受业焉。<sup>[2] (P. 2806)</sup>

慕容廆是前燕政权的创立者,统一了鲜卑宇文部和段部,消灭了其它一些割据政权。慕容廆对于汉族流民的安置举措,是采取类似东晋设立侨郡的举措,并且笼络了大批流民中的士族著姓。从史籍记载来看,这一时期逃亡到辽东地区的汉族流民为数不少,其中有的来自冀州、豫州、青州、并州等地,也就是说,其来源包括今河北、河南、山东、山西等广大区域。当然,慕容氏也由此得到了

北方许多著姓的支持,如河东裴氏、渤海封氏、安定皇甫氏。在这当中,特别需要注意的是,慕容氏政权所庇护和笼络的汉族文人,并不局限于上述区域的高门望族,而是包括了西北安定的皇甫岌和东南会稽的朱左车,这充分证明慕容氏政权受到了北方汉族人民及士族文人的广泛支持。当时辽东一带“流人之多旧土十倍有余”<sup>[2] (P. 2823)</sup>,流民的到来不仅使人口得到了大幅度的增长,也使得这些区域成为汉族人口的聚居区。

同时,慕容氏政权亦吸纳了大量的汉族地主参与统治,其最高统治阶层本身也逐渐汉化了。例如,继慕容廆当政的慕容皝,《晋书·慕容皝载记》称“皝雅好文籍,勤于讲授,学徒甚盛,至千余人。”<sup>[2] (P. 2826)</sup> 慕容皝能自讲经,说明其有较高的儒学修养。而慕容皝攻灭冉魏政权之后,迁都于邺(今河北临漳县),将其统治重心移至幽冀区域之后,其朝仪、典章、官制等方面,实有浓厚的魏晋旧制之遗风。《晋书·慕容皝载记》记载:

皝给事黄门侍郎申胤上言曰:“夫名尊礼重,先王之制。冠冕之式,代或不同……祭飨朝庆,宜正服衮衣九文,冠冕九旒……大燕受命,侔踪虞夏,诸所施行,宜损益定之,以为皇代永制。”皝曰:“……事下太常参议……冠服何容一施一废,皆可详定。”<sup>[2] (P. 2835-2836)</sup>

文中提到“给事黄门侍郎”、“太常”等官职,充分说明前燕官制多沿袭魏晋之旧;文中申胤所上言的祭祀、朝庆、冠服之仪,亦直接表明前燕汉化举措之深入和全面。

慕容氏政权由辽东一隅扩展至幽、冀及河东一带,实与北方华夏文化的复兴和五胡汉化同步,而幽冀、河东区域在慕容氏的统治之下,逐渐成为北方学术文化的重心所在。虽然前燕灭于前秦苻坚,但淝水之战后,慕容垂又依靠汉族豪强的支持,建立了后燕政权。这一政权存在二十余年,后为北魏拓跋氏所灭。另外,慕容德也在青、齐之地建立了南燕政权,这一政权延续了十二年,后被刘裕所灭,至北魏中期,此地又为拓跋氏所占据。北魏之所以能成为中古时期统治北方最久、地域最广的少数民族政权,当然除了在崛起时便较为迅速地夺取慕容氏政权之故地这一原因之外,还与其承袭和接纳了慕容氏政权所笼络的汉族人才及其文化密切相关。

## 二、北魏前期的汉化与慕容氏之旧属

北魏打败慕容垂的后燕政权之后,汉化进程

即全面展开。拓跋氏在扩大统治区域的同时,也非常注重笼络慕容氏政权之旧属。这些旧属包括了原本依附慕容氏的流民后裔与前燕统治区域幽、冀等地的人才,并在这些士族文人的努力下,使得北魏的典章制度和意识形态,均呈现出较为浓厚的魏晋遗风和儒学色彩。

北魏拓跋氏源于漠北,在慕容氏政权统治辽东和幽冀一带时,二者往往相互通婚,交往颇为密切。考虑到这一时期慕容氏政权已有相当程度的汉化,那么,拓跋氏当然也会直接或间接地受到汉族文化的影响。事实上,拓跋氏在征服慕容氏的过程中,便继承了后者注重笼络汉族人才的做法。北魏登国十年(395年),道武帝拓跋珪大破慕容宝于参合陂,这是北魏灭燕的关键之役,此战拓跋珪俘虏了后燕文武官吏数千人,《魏书·太祖本纪》记载“于俘虏之中擢其才识者贾彝、贾闰、晁崇等参与谋议,宪章故实。”<sup>[3][P.27]</sup>其中贾彝在《魏书》有传,贾闰不见史传。《魏书·贾彝传》提到参合陂之役“执彝及其从兄代郡太守润等”<sup>[3][P.792]</sup>,贾闰似为贾润之误。时人目贾彝为“贾谊之后,莫之与京”,作为东汉著名学者、文学家贾谊的后人,贾彝及其从兄贾润当是慕容氏旧属当中的杰出文人官僚。这批人在被俘之后,即受到北魏统治者的重用,其所预示的历史意味是不言而喻的。

拓跋珪在皇始元年(396年)灭亡后燕之后,继续施行积极笼络后燕汉族士人的政策。《魏书·太祖本纪》又称“初建台省,置百官,……尚书郎以下悉用文人。帝初拓中原,留心慰纳,诸士大夫诣军门者,无少长,皆引入赐见,存问周悉。”<sup>[3][P.27-28]</sup>虽然这一时期汉族文人不能担任北魏重要官职,但“尚书郎以下悉用文人”,则充分说明幽、冀等前燕统治区域的汉族文人,已初步实现与拓跋氏政权的合作。

天兴元年(398年),北魏开始制定官职、礼仪等典章制度,其中的参与者,或为慕容氏政权之旧臣,或为慕容氏旧属之子孙。《魏书·太祖本纪》记载“诏尚书吏部郎中邓渊典官制,立爵品,定律吕,协音乐;仪曹郎中董谧撰郊庙、社稷、朝觐、饗宴之仪;三公郎中王德定律令,申科禁;太史令晁崇造浑仪,考天象;吏部尚书崔玄伯总而裁之。”<sup>[3][P.33]</sup>其中董谧、王德史籍无传,可不论。其余邓渊、晁崇、崔玄伯等人,与慕容氏甚有渊源。《魏书·邓渊传》称邓渊父邓翼为慕容垂所用,并称邓渊“明解制度,多识旧事”<sup>[3][P.634-635]</sup>,是北魏

初期官制的重要制定者。《魏书·晁崇传》称晁崇“辽东襄平人,家世史官”,晁崇为慕容垂太史郎<sup>[3][P.1943]</sup>。崔玄伯是清河东武成人,当属北徙流民著姓之典型,《魏书·崔玄伯传》称“其父崔潜,仕慕容暉,为黄门侍郎,并有才学之称。玄伯少有雋才,号曰冀州神童”<sup>[3][P.620]</sup>。北魏太武帝拓跋焘时期,崔玄伯之子崔浩深受重用。崔玄伯、崔浩父子对于北魏政权汉化之影响,当是极为深远的。

在制定典章制度的同时,拓跋珪也颇重视官方儒学的复兴。《魏书·太祖本纪》记载天兴二年(399年)三月甲子,“初令《五经》群书各置博士,增国子太学生三千人。”<sup>[3][P.35]</sup>若非继承了慕容氏时期之规模,在短时期内国子太学便增至三千人是不可想象的。《魏书·儒林传》又称“太祖初定中原……立太学,置五经博士生员千有余人。天兴二年春,增国子太学生员至三千。”<sup>[3][P.1841-1842]</sup>文中提到的“初定中原……置五经博士生员千有余人”,当是北魏继承慕容氏国学之旧制。而经道武帝拓跋珪、明元帝拓跋嗣及太武帝拓跋焘等三个时期的努力,北朝儒学实现初步复兴。事实上,儒学复兴的实现,慕容氏旧臣及其子孙当然是最主要的参与群体。其中以太武帝于431年征举卢玄、高允等为中书博士一事最具代表。这一诏令中提到“访诸有司,咸称范阳卢玄、博陵崔绰、赵郡李灵、河间邢颖、渤海高允、广平游雅、太原张伟等,皆贤雋之胄,冠冕州邦,有羽仪之用。”<sup>[3][P.79]</sup>上述诸人当中,卢玄、李灵、高允等辈均系慕容氏旧臣之子孙。卢玄《魏书》本传提到“祖偃,父邈,并仕慕容氏为郡太守,皆以儒雅称”<sup>[3][P.1045]</sup>。关于赵郡李灵,据李灵《魏书》本传,李灵为李顺从父兄,而《魏书·李顺传》称李顺“父系,慕容垂散骑侍郎,……顺博涉经史,有才策,知名于世。神瑞中,中书博士,转中书侍郎”<sup>[3][P.829]</sup>,可见赵郡李系、李灵是先后为中书博士,是其时官方学者的重要代表。关于渤海高允,《魏书》本传提到“父韬,少以英朗知名,同郡封懿雅相敬慕。为慕容垂太尉从事中郎。太祖平中山,以韬为丞相参军”<sup>[3][P.1067]</sup>。又据《魏书·高湖传》,高允祖父高庆也为慕容垂所用<sup>[3][P.751]</sup>,渤海高氏的情形与赵郡李氏相类似。至于博陵崔绰、广平游雅、太原张伟,与卢玄、李灵、高允等同属其时北方著姓高门之代表人物。可以这样说,北魏所笼络的慕容氏旧属,大多属于北方旧有的世家大族,这其中除了上述诸辈外,还有清河崔氏、京兆韦氏、杜氏等望

族的俊才。《魏书》崔逞本传称其为“魏中尉琰六世孙”,我们知道崔琰为郑玄弟子,崔逞当是其时郑学家传之典型代表,而崔逞也曾仕于慕容氏<sup>[3] (P. 757)</sup>。至于京兆韦氏,据《魏书·韦阆传》,韦阆出自京兆杜陵韦氏,京兆韦氏一直为三辅冠族,而韦阆“父逵,慕容垂吏部郎、大长秋卿”<sup>[3] (P. 1009)</sup>。至于京兆杜氏,《魏书·杜铨传》称:“晋征南将军预五世孙也。祖胄,苻坚太尉长史。父嶷,慕容垂秘书监,仍侨居赵郡。铨学涉有长者风,与卢玄、高允等同被征为中书博士。”<sup>[3] (P. 1018)</sup>杜铨作为杜预之后人,也被征为中书博士。由此可知,北魏前期之汉化与复兴儒学的举措,无疑处处都有慕容氏旧属之参与和主导。

在这些汉族文人看来,无论是慕容氏还是拓跋氏,其实均可一视同仁,而所应致力者,乃是挽华夏文化于既倒之后,是其不变之初衷也。例如崔浩,即为此辈之典型代表。尽管崔浩最终未能实现其根本之意图,不过,汉化和儒学化仍是其时北朝历史之趋势。在崔浩之后,此种趋势的具体流行,显得愈益复杂。其直接原因,即在于北魏统治疆域在太武帝拓跋焘至孝文帝拓跋宏时期又进一步扩大,并引发了北魏文化和学术风貌的巨大变化。具体而言,拓跋焘于延和三年(434年)平定河西,太延元年(435年)诏徙长安及平凉民至京师;而北魏献文帝皇兴三年(469年)占有青齐之地后,又诏徙青州民于京师。这种迁徙是非常残酷的,不过,也从客观上促进了北朝学术和文化的融合。

可以这样说,自北魏登国十年(395年)参合陂之役俘虏数千慕容氏旧属以来,至北魏孝文帝太和十七年(493年)迁都洛阳为止的一百余年间,乃是北魏汉化的第一阶段,这一阶段汉化的主导者和北朝学术文化的复兴者,主要是以慕容氏旧属为代表的幽、冀学者,以河西、河南学者为辅。关于河西学者对于北朝文化复兴之影响,以张湛、宗钦、段承根、阚骃、刘昞、赵柔、索敞、阴仲达等平凉民之徙代郡者为显例,《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述之已颇为详尽<sup>[1] (P. 22-47)</sup>。至于河南学者对于北朝汉化之贡献,又以北魏学者刘芳、崔光、蒋少游等北齐民为典型,陈先生对此亦有论述,现代学者唐长孺撰有《北魏的青齐士民》一文,论之也颇为精当<sup>[4] (P. 92-122)</sup>。

太和十七年(493年)之后,北朝汉化的面貌,在河北、河南、河西以及南朝学术的互相影响之

下,又与前期有所不同。这一不同主要体现为北朝汉化的参与群体开始出现南朝学者,而南北学者对于此种主导权的纠纷,又可说是北朝汉化应有的题中之义。

### 三、王肃北奔及其影响之评价

北魏孝文帝时期,南朝学者王肃北奔乃是令人瞩目的大事。陈寅恪在《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一书中,对王肃之于北魏典章制度的影响,有极高的评价,并视其为将江左文物典章制度全盘照搬于北朝之典型代表。然而,仔细考察王肃在北魏的境遇,陈氏这一结论实可加以修正。通过考察,王肃对于北魏典章制度的贡献主要集中于官制,其对于北魏的礼仪、宗庙之制,试图加以变革而遭到北朝学者的强烈反对。中古时期,南北地域歧见甚深,学者周一良在其所撰的《魏晋南北朝史札记》的“晚度北人”一条中,对此已有论述<sup>[5] (P. 190-192)</sup>。王肃在北魏的境遇,也从侧面体现出南北学者的畛域偏见,以王肃为典型的南朝文化对于北朝汉化的影响和贡献,决不能随意夸大。

北魏孝文帝拓跋宏在历史上以歆慕华夏文化而闻名,北魏政权在孝文帝时期实现了较为彻底的汉化。拓跋宏对于江南才士,也颇为倚重。《南齐书·魏虏传》记载:“拓跋宏甚重其人,常谓其臣下曰‘江南多好臣。’伪侍臣李元凯对曰‘江南多好臣,岁一易主;江北无好臣,而百年一主。’宏大慙,出元凯为雍州长史,俄召复职。”<sup>[6] (P. 992)</sup>此事颇可值得称述。拓跋宏对江南才士的仰慕,时时溢于言表。而文中所提及的李元凯,当是《魏书·李先传》所附的李先之孙李预,李先历仕苻坚、慕容氏及拓跋氏,为北土旧臣的典型,李元凯之讥刺,又可以说代表了北魏臣属对拓跋宏重南士、轻北人的意态深为不满。故而考察王肃北奔,应充分考虑上述两种因素。

《魏书·王肃传》记载“王肃,字恭懿,琅邪临沂人,司马衍丞相导之后也。……肃自谓《礼》、《易》为长,亦未能通其大义也。父奂及兄弟并为萧贲所杀,肃自建业来奔。是岁,太和十七年也。”<sup>[3] (P. 1407)</sup>此为王肃之出身及太和十七年(493年)北奔之背景。《魏书》本传又称“高祖幸邺,闻肃至,虚襟待之,引见问故。……肃亦尽忠输诚,无所隐避,自谓君臣之际犹玄德之遇孔明也。”<sup>[3] (P. 1407)</sup>根据这一记载,王肃对于北魏孝文帝的汉化改革所起的作用,应是极大的。而事实上,所谓“君臣之际犹玄德之遇孔明”,乃是史家溢美

之词,非实情描述也。试看《魏书·傅永传》记载:“王肃之为豫州,以永为建武将军、平南长史。咸阳王禧虑肃难信,言于高祖。高祖曰‘已选傅修期为长史,虽威仪不足,而文武有余矣。’”<sup>[3]</sup> (P. 1551) 傅永为平齐民,在北魏最高统治者眼中,并不视平齐民为南人。拓跋宏派傅永为王肃长史,监视王肃,所谓“威仪不足,而文武有余”,暗示傅永在必要时甚至可以采取武力控制王肃,这是北魏并不完全信任王肃之显例也。《魏书·王肃传》又称“高祖崩,遗诏以肃为尚书令,与咸阳王禧等同为宰辅,征肃会驾鲁阳。……唯任城王澄以其起自羁远,一旦在己之上,以为憾焉。……寻为澄所奏劾,称肃谋叛,言寻申释。”<sup>[3]</sup> (P. 1410) 孝文帝遗令王肃、咸阳王元禧为宰辅,实有相互掣肘之用意。而任城王元澄仍以羁远之辈视王肃,并奏劾王肃谋叛。可见王肃之能得意于北魏,实有赖于拓跋宏一人之信用。

若从其时北朝官僚的意态而论,不免视王肃为异类,《魏书·祖莹传》记有一件小事,王肃在官署中曾咏《悲平城》一诗,彭城王元勰希望王肃再次朗诵此诗,不过,元勰误将《悲平城》念成《悲彭城》,王肃不免戏谑,祖莹主动为元勰解围,元勰很高兴,私下里跟祖莹说“即定是神口。今日若不得卿,几为吴子所屈。”<sup>[3]</sup> (P. 1799) 在中古时期,所谓吴子、吴儿之称,含有深刻的贬义。例如,《梁书·胡僧祐传》记有侯景部将任约在阵前呼胡僧祐为“吴儿”<sup>[7]</sup> (P. 640),即表示极度蔑视。

此种地域歧视是相互的,王肃亦抱有南朝士人的优越观念,对北朝士人亦不甚钦重。王肃北奔之初,北魏官方派遣成淹南下迎还,《魏书·成淹传》称:

行到朝歌,肃问“此是何城?”淹言“纣都朝歌城。”肃言“故应有殷之顽民也。”淹言“昔武王灭纣,悉居河洛,中因刘石乱华,仍随司马东渡。”肃知淹寓于青州,乃笑而谓淹曰“青州间何必无其余种?”淹以肃本隶徐州,言“青州本非其

地,徐州间今日重来,非所知也。”<sup>[3]</sup> (P. 1753)

王肃嘲弄北朝应有“殷之顽民”,引发成淹之讥讽。成淹亦为平齐民出身,只是较早降魏,而二人代表各自之地域观念,讥刺对方,又别有深意。在成淹看来,所谓青、齐一带的河南之地,绝非王肃心目中之南土。陈寅恪将同为平齐民出身的刘芳、崔光等人视为“南朝俘虏”,意即平齐民出身的学者代表了南朝文化而不同于北朝学者,从表面上看似无问题,不过,若是从其时南北地域观念之畛域而言,则不免为谬。进一步言,青、齐一代在刘宋时期始接受南朝统治,而刘宋往往将其视为边地,加以羁縻而已,这一统治也仅持续了六十余年,之后便一直归属于北魏。而在刘宋之前,青、齐之地一直属于北方少数民族政权的势力范围,因不论而从历史还是从地域观念而论,青、齐学者往往多自视为北朝学者,甚少能以江左文化之代表自居。考虑到这一点,那么王肃恐怕不能与青、齐学者等同看待,而北魏后期青、齐学者对于北朝汉化的影响,亦不能简单视为南朝文化的贡献。

综上所述,历史之流衍有其渊源和根本,北魏汉化前后二百余年,其举措涉及北魏典章制度、种族认同以及意识形态等各个方面,其参与主体,又非上溯至西晋末以来慕容氏政权之笼络的中原流民及其士族文人不可,此种渊源可谓流长矣。

#### 参考文献:

- [1] 陈寅恪. 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M].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1.
- [2] 房玄龄. 晋书[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4.
- [3] 魏收. 魏书[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4.
- [4] 唐长孺. 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3.
- [5] 周一良. 魏晋南北朝史札记[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5.
- [6] 萧子显. 南齐书[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2.
- [7] 姚思廉. 梁书[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3.

收稿日期: 2011-09-26 责任编辑 杨春蓉